

专题研究: 纪念《乌托邦》诞生 500 周年

编者按: 1516 年, 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的问世标志着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开端。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一说由此而来。120 年前, 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首次借用了渊源于莫尔的“乌托邦”的英文“Utopia”一词, 精心构思了一个音译与意译巧妙结合的汉语新词“乌托邦”。80 年前, 刘麟生翻译的首部汉译本《乌托邦》问世。莫尔的《乌托邦》及其“乌托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深深地扎根于这片沃土, 并与这片土地上悠远绵长的大同理想相结合, 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成为当下中国人为之奋斗的“中国梦”的一大思想源头。值此《乌托邦》发表 500 周年之际, 站在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历史节点上, 返本溯源, 重温莫尔的这部不朽名篇, 无疑会增加其难以言说的独特韵味。为此, 本刊特推出这组文章, 以兹纪念, 以飨读者。

莫尔乌托邦思想的文化和理论渊源

蒲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莫尔的乌托邦思想的文化和理论渊源极为庞杂。柏拉图的“理想国”、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圣经中记载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中世纪天主教会修道院共产主义及其个人所处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等, 都是莫尔绘制理想草图的思想素材, 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文学和游记则是直接孕育《乌托邦》一书的温床。《乌托邦》一书的问世, 开创了近代欧洲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先河, 预示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关键词: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乌托邦; 理论渊源

中图分类号: D0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6)05-0024-05

The Cultural and Theoretical Sources of Thomas More's Utopia

PU Guoli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omas More's Utopia has diversified cultural and theoretical sources. Plato's "Republic", the ancient Grecian and Roman culture, the Primitive Christian Communism in the Bible, the medieval Catholic Monastery - communism, the humanism of his time, etc., all these are the source materials which Thomas More draws in his description of the ideal community of mankind. And then the literary works and travel notes about the Great Discoveries of Geography are the breeding ground of Utopia. The publication of Utopia marks the birth of modern European Utopian Socialism and the coming of a new era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Key words: Thomas More; Utopia; utopia; theoretical sources

收稿日期: 2016-08-0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研究”(编号: 08JJD710019)

作者简介: 蒲国良(1966-), 男, 河南柘城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

莫尔乌托邦思想的文化和理论渊源颇为庞杂。广义上说,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的人文主义者,莫尔汲取了从柏拉图以来直至中世纪积累起来的大量文化和思想营养。

一、《乌托邦》深受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

早在青年时代,莫尔就对柏拉图的对话体名著《理想国》(直译应为《共和国》)爱不释手。莫尔的早期传记作家斯塔普顿断言,在哲学家中,莫尔“最喜欢阅读和研究柏拉图及其学派的著作,因为从中可以了解到关于国家管理、公民的社会生活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的许多事情”。^{[1] (p25)} 用莫尔的挚友伊拉斯谟的话说,莫尔酷爱柏拉图关于公有制的学说,并千方百计为之辩护。^{[2] (p25)}

莫尔撰写《乌托邦》时,不仅在文体形式上模仿了柏拉图的对话体,而且在内容上也随处可见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对此,莫尔本人在不同场合也是坦陈不讳。1516年12月4日前后致伊拉斯谟的信中,莫尔便明确把乌托邦称为“我们的共和国”。^{[3] (p122)} 1518年3月的巴塞尔版《乌托邦》序文部分假借乌托邦桂冠诗人、书中主人公希斯拉德的外甥阿尼莫留斯之手所写的一首六行短诗更为坦白地道出了莫尔的乌托邦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间的关系,即今日之乌托邦乃昔日柏拉图理想国之重现,只不过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只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而莫尔的乌托邦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天堂。^①

正因为莫尔《乌托邦》中有太多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有评论家喜欢把《乌托邦》称为《理想国》的续篇或姊妹篇。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思想渊源上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莫尔《乌托邦》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毕竟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的产物。柏拉图的《理想国》所描绘的是理想的奴隶制国家,而莫尔的《乌托邦》所勾勒的则是未来无阶级社会的蓝图。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那里,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性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4] (p424)} 而莫尔的乌托邦却是近代共产主义思想的滥觞。

二、《乌托邦》中渗透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

年轻的莫尔曾如饥似渴地攻读和钻研拉丁文,熟谙古希腊罗马文学并对其崇拜有加。因此,他笔下的乌托邦公民自然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情有独钟。乌托邦人赞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赞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卢塔赫等人的作品,并高度评价荷马、阿里斯托芬、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当然还有莫尔本人所钟爱的琉善。^{[5] (pp75-76)}

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不仅影响了莫尔的人文主义思想,并贯穿到《乌托邦》的写作中,而且还直接影响了莫尔《乌托邦》的话语结构与叙事风格。例如《乌托邦》第二部中有关官员一章,对乌托邦共和国管理制度的讨论^{[5] (pp47-48)} 与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相关内容^{[6] (p60-61)} 惊人地相似;而关于乌托邦人的宗教部分有关教士的描述^{[5] (p98-99)} 差不多是逐字逐句地转录了尤利乌斯·凯撒《高卢战记》卷六第十三节的相关内容,与凯撒所刻画的高卢祭司极其雷同;^{[7] (p138-139)} 这里就更不用说《乌托邦》与柏拉图《理想国》的亲缘关系了。

信手拈来的古希腊罗马作品中的许多情节居然能够浑然天成般地嵌入《乌托邦》中,既是莫尔精研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的明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对《乌托邦》的影响。

① 六行短诗拉丁文原文如下: Vtopia priscis dicta ob infrequentiam Nunc ciuitatis aemula Platonicae Fortasse Uictrix (nam quod illa literis Delinquit hoc ego una praestiti Viris & opibus optimisque legibus) Eutopia merito sum uocanda nomine. 参见 *The Complete Works of St. Thomas More* vol. 4,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第20页。

耶鲁版《莫尔全集》中这段诗的英译文为: The ancients called me Utopia or Nowhere because of my isolation. At present however I am a rival of Plato's republic perhaps even a alone have exhibited in men and resources and laws of surpassing excellence. Deservedly ought I to be called by the name of Eutopia or Happy Land. 参见 *The Complete Works of St. Thomas More* vol. 4,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第20页。

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版《乌托邦》中的英文是 'No - place' was once my name I lay so far; But now with Plato's state I can compare Perhaps outdo her (for what he only drew In empty words I have made live anew In men and deeds as well as splendid law): 'The Good Place' they should call me with good cause. 参见 George M. Logan and Robert M. Adams: *Thomas More Utop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三、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对莫尔乌托邦思想的潜在影响

原始基督教关于千年天国的描绘表达了早期基督徒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最初的基督教会组织完全是为穷人设立,富人是被摒弃在外的。在那里,财产完全是公有的,绝不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据《使徒行传》记载,信众们群聚一处,共同生活,他们有无相通,凡物公用,实行按需分配。^{[8](2章:44-45节)}“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变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分给他们。”^{[8](2章:32、34-35节)}另据记载,皈依基督教的亚拿尼亚和撒非拉夫妇变卖家产的时候没有把所得全部钱财拿出来共享,而是“私自留下了几分”,结果两人都被使徒彼得处死了。^{[8](5章:1-10节)}

圣经中有关人人平等、财产公有、共同生活的小型共产主义团体的记载,曾一再引起那些关注社会不平等现象、探索摆脱社会压迫和剥削问题的有志之士的关注,激励着他们从中汲取思想营养。

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莫尔认真研究了神学著作,对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文学都非常熟悉。莫尔的挚友伊拉斯谟正是1510-1514年间在剑桥大学教授希腊文和神学时完成的希腊文版《新约》的翻译工作,这一工作曾得到莫尔的鼎力相助。这一时期的莫尔和伊拉斯谟及其他人文主义者都充满着回到原始基督教的渴望,即希望教会从繁文缛节的教条和仪式中解脱出来,回到《圣经》和教父派那里去。年轻的莫尔在林肯法学院学习时就曾精研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并在圣劳伦斯教堂讲解过这部晦涩难懂的作品。^{[1](p7-8)}听众席上不仅有其老师、著名人文主义者格罗辛,还有当时伦敦市的一众饱学之士和诸多头面人物,他们都为年轻莫尔的神学造诣所倾倒。^{[3](p129)}

对莫尔的知识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基督教人文主义。他坚信,通过复兴古典和基督教的古代遗产,可以去除中世纪所有的弊病和曲解,拯救现实社会。不难想象,面临大规模剥夺农民和劳动者贫困化的疾风暴雨,对广大劳动者深表同情的莫尔,苦苦思索摆脱不平等和阶级剥削与压迫之途的莫尔,脑海中一定萦绕着一缕挥之不去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精神。

四、中世纪修道院共产主义为莫尔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另类样板和现实参照

作为一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莫尔对教会的腐败与修道院暴露出来的弊端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但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修道院的修行方式却又情有独钟。^{[9](p76)}莫尔崇尚苦修,厌恶财富,时常攻击富人而享有“穷人的好朋友”之誉。^{[9](p39)}在《乌托邦》中,莫尔对教士的愚昧无知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但修道院修士们的生活方式却又若明若暗地在乌托邦人身上显现。^{[9](p85) [10](p6)}

莫尔之所以对修道院青眼有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修道院对人民的剥削相比,他更看重的是修道院在阻止农民无产者化和救助穷人流浪者方面的功能。当时的英国,当新贵族和新兴的资产者纷纷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以追逐更多利润的时候,拥有大量地产的修道院仍然采取的是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即继续使用大量的劳动力来经营他们的一部分土地,并企图用尽可能好的待遇留住自己土地上的隶农;对待佃农,他们也尽可能地签订长期的租佃契约。显然,修道院的存续在某种程度上延滞了农民的无产者化进程。^{[11](p194-195)}另一方面,中世纪的教会本来就承担着济贫的责任,当天灾人祸降临时,只要灾情程度不致损害教会本身,教会就如同救苦救难的天使一般,往往会开仓放粮,赈济贫民。^{[11](p41)}各地的修道院也俨然成了巨大的济贫机构,收容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圈地运动之风乍起,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倘若教会和修道院制度再受冲击,便无异于雪上加霜。

正因为莫尔反对农民的无产者化和被剥削、被掠夺,他自然也就维护负有收容和救济难民之责的教会和修道院制度。在莫尔看来,虽然这一制度亟需修正,却不能因此就矫枉过正,废除中古时代因袭下来的群体生活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认为,莫尔是旧时代最后一人,而不是新时代最先一人。他心中仍然充满中世纪盛行的结社精神,因此十分排斥早期的

重商主义。日渐衰落的生活的修道院精神与新兴的重商主义所带来的贪欲是不能相容的。站在十字路口的莫尔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难道修道院的生活的精神不是更值得让人留恋吗?因此,在莫尔的乌托邦中,虽然不主张独身,却贯彻了修道院精神。那里的人就像圣方济会修士一样没有私有财产,穿着同样的衣服,使用公共食堂就餐,作息和娱乐都有节制。可以说,行将解体的中世纪修道院共产主义以扭曲的形式为莫尔的乌托邦思想提供了另类样板和现实参照。

五、莫尔身处其中的人文主义思潮和方兴未艾的地理大发现给《乌托邦》注入了时代元素

莫尔深受所处时代人文主义思潮的浸染,从而给《乌托邦》注入了深厚的人文主义元素。莫尔学养深厚,掌握着他所处时代的大量著作,何况他本人即为人文主义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其乌托邦思想受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

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同伊拉斯谟的关系,二人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伊拉斯谟的《愚人颂》同莫尔的《乌托邦》在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性,二者甚至被称为“姊妹篇”。^{[12] (p78)}《愚人颂》的“愚人”之名及该书的构思灵感均来自“莫尔”这一名字,^{[13] (p1)}该书的写作则是在莫尔家里并在其力促下完成的。^{[9] (p107)}而莫尔补写《乌托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结语期间,也适逢伊拉斯谟在莫尔家小住,有理由相信二人进行过深入讨论,《乌托邦》的出版更是得益于伊拉斯谟的倾力相助。^[14]不仅如此,从内容上看,两部著作对教士的批判、对神学家和经院哲学的嘲弄,甚至其中的某些情节都极其相似。连称赞莫尔为教会而殉道的天主教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不过,在他们眼里,更愿意认为是伊拉斯谟给莫尔造成了不良影响。^{[15] (p83)}

当然,影响莫尔乌托邦思想形成的人文主义者决不止伊拉斯谟一人。莫尔不仅博览群书,而且结交甚广,又是人文主义思潮的领袖人物,广纳百家,信手拈来,自非难事。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正值欧洲历史上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亦即欧洲人开辟美洲和亚洲新航路的时代。当时到过美洲新大陆和亚洲、非洲等地的一些水手和冒险家纷纷将美洲等地的见闻介绍给欧洲人。其中就有大量关于尚处于原始公有制时期的美洲印第安人生活情景的报道。例如,1500年7月发现南美东北约1200公里海岸线的意大利商人、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阿美利哥·维斯普契(Amerigo Vespucci, 1454-1512),后人以他的名字命名了美洲,即阿美利加洲。1507年,阿美利哥·维斯普契的书信集问世。1511年,昂吉埃拉(Pietro Martire d'Anghiera, 1457-1526)即殉道者彼得(Peter Martyr)的《论新大陆》出版,作者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叙述了西印度群岛居民的生活情况。莫尔对这两部书非常熟悉,并在撰写《乌托邦》时加以参考,他甚至把《乌托邦》一书的主人公说成是维斯普契最后三次航行的参加者之一。在主人公讲述有关乌托邦的故事时,就引用了维斯普契所描述的1503年最后一次航行时的情节。

不仅如此,亨利七世时期,英国也加入了航海探险之列。在莫尔十九岁那年,寄居英国布里斯托尔的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 约1450-约1499)曾率领英国船队到达美洲大陆。亨利七世后期,布里斯托尔设立的“新发现地探险公司”曾多次组织远航,甚至还曾带回三个穿毛皮、吃生肉的土著人送给英王。对远洋探险极感兴趣的莫尔对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故事不可能无动于衷。更值得注意的是,莫尔的妹夫约翰·赖斯提尔就是一位远洋探险爱好者,经常向莫尔一家讲述种种探险故事。就在《乌托邦》出版六个月之后,赖斯提尔就乘巴巴拉号航船从格林威治出发去寻找新的“处女地”了。

可以说,正是地理大发现时期大量关于世界其他地方未开垦处女地的游记、传闻和报道,使莫尔找到了灵感,找到了表达自己思想的合适的形式。因为“借他人之口立言,在十六世纪不单是摹袭一种古典形式,并且还是对猜忌多端的专制主义所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11] (p207)}

六、《乌托邦》的出版与乌托邦思想的诞生

《乌托邦》一书采用游记对话的文学体裁写成,这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而莫尔撰写此书时又采用

了当时的学术语言拉丁语,无疑更增加了该书的严肃性。在《乌托邦》中,莫尔精心安排了一个跟随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契三次航海到南美洲探险的葡萄牙人拉斐尔·希斯拉德作为对话的中心人物,详细描述了刚刚远洋航行归来的旅行家与莫尔关于乌托邦岛的谈话,借希斯拉德之口批判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现实,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描绘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16]

莫尔在书中以在场者的身份叙述说:他奉国王之命出使法兰德斯期间,利用闲暇时间到访安特卫普,结识了彼得·贾尔斯,两人一见如故,过从甚密。一天,他在街上遇到贾尔斯同一个海员模样的人同行。此人便是曾随亚美利哥·维斯普契远航的葡萄牙人拉斐尔·希斯拉德。在阿美利哥·维斯普契第四次航行时,希斯拉德也曾随行前往,并且是阿美利哥留在新大陆一个要塞上的24人中的一个。可是希斯拉德并没有停留在那里。他在当地土人的帮助下,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有些地方具有文化很高的特别完备的制度,乌托邦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在乌托邦住了五年。为了把乌托邦的范例介绍给欧洲,他离开了那里。在到达印度时,他遇到了一艘葡萄牙船,于是便搭船回国了。莫尔对于这位曾经远航的人非常感兴趣,于是便邀请他和彼得·贾尔斯一起到自己家里畅谈。希斯拉德对乌托邦岛所见所闻惟妙惟肖的讲解,经莫尔的生花妙笔记述,便是《乌托邦》一书的由来。

莫尔在1515年5月至10月出使法兰德斯期间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动笔用拉丁文撰写这部作品。但其间只完成了该书的第二部的大部分,回到英国后才又补写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结语。在伊拉斯谟和贾尔斯的倾力相助下,《乌托邦》一书终于在1516年底正式出版,出版时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世界名都伦敦才德出众、议论风生的市民、副司法行政官托马斯·莫尔著》。随着《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乌托邦思想诞生了。《乌托邦》一书的问世,开创了近代欧洲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先河,预示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 [1] Thomas Stapleton, Translated by Philip E. Hallett; Edited by E. E. Reynolds: *The Life and Illustrious Martyrdom of Sir Thomas More* [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66.
- [2] P. S. Allen ed. et al., *Opus Epistolarum Des. Erasmi Roterodami* vol. 4(1519-1521) [M]. Reissue: Clarendon Press, 1992.
- [3] [英]托马斯·莫尔. 乌托邦[M]. 戴镗龄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George M. Logan and Robert M. Adams. *Thomas More Utopia*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6] [古罗马]塔西佗.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M]. 马 雍, 傅正元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7] [古罗马]凯撒. 高卢战记[M]. 任炳湘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8] 圣经·使徒行传.
- [9] [英]雷蒙德·钱伯斯. 托马斯·摩尔[M]. 梁怀德译.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93.
- [10] [英]安东尼·肯尼. 摩尔[M]. 王天棣译.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85.
- [11] [德]考茨基. 莫尔及其乌托邦[M]. 关其侗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 [12]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 伊拉斯谟传: 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M]. 何道宽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13] [荷兰]伊拉斯谟. 愚人传[M]. 许崇信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14] 蒲国良. 《乌托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辨析[J]. 福州大学学报, 2016 (4).
- [15] Thomas Edward Bridgett. Life and Writings of Sir Thomas More [A]. *Lord Chancellor of England and Martyr Under Henry VIII London*, 1891 [C]. Rarebooksclub. com, 2012.
- [16] 蒲国良. 乌托邦: 莫尔的理想国[J]. 党政研究, 2016 (4).

(责任编辑: 郭荣华)